

淺評「菊花與劍」

許木柱

書名：菊花與劍

著者：Ruth Benedict

譯者：黃道琳

出版者：華新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六十三年

• 99 •

「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的作者潘乃德(Ruth Benedict)是首屈一指的女人類學家，要了解「菊花與劍」的思潮，必須回溯至她第一本聞名人類學界之重要著作，亦即在一九三四年所發表的「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書。在「文化模式」中，潘乃德借用尼采研究希臘悲劇時的兩個名詞——日神型(

Apollonian)與酒神型(Dionysian)——來形容兩種不同的文化模式。潘乃德認為每一個文化大多具有一個能够涵蓋其成員大部份行爲的模式，這就是她所說的文化的模式。而每一種文化模式大體都表現出若干獨特的性格特徵，例如，日神型文化(典型的例子爲北美印第安人的朱尼族文化)所表現的性格是規律、自制和樂羣；酒神型文化(如美拉尼西亞羣島

的杜布人和美加交界的瓜求圖印第安人）則表現出粗暴、狂野及個人主義的傾向。因此，所謂的文化模式，實際上是指一個文化羣的羣體性格。而潘乃德的「文化模式」一書可說是開啓國民性研究的先驅。至一九四〇年代初期，由於戰爭而導致美軍迫切的需要了解敵人的文化與民族性，因此委託許多人類學者從事有關國家國民性的研究，特別是對於日本與俄羅斯民族的國民性研究，在數量上更是大量增加。潘乃德是當時參與研究的學者之一，她的研究對象是日本。戰爭結束之後，潘乃德將她在戰爭期間收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寫成「菊花與劍」一書，而在一九四六年出版。

「菊花與劍」這本書的副標題是：日本的文化模式，潘乃德將「文化模式」中的對比觀念應用到日本的研究上，由於日本民族具有普遍的美感崇拜，酷愛菊花的栽植，同時也着重對劍的崇拜與武士的尊貴，因此，潘乃德用菊花與劍來代表日本人兩套對應而並存的性格（或者說是文化模式）。潘乃德在美國本土，利用少數的報導人及日本的文化產物——電影、戲劇、小說、諺語……等——去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最後認為：「菊花與劍都是構成日本民族性的一部份

。日本民族無與倫比的兼具了下列各種性格：好戰而祥和、驍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第一章）。日本人的這種兩面性格不僅表現在和平時期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適用到戰時的態度與行為上，這些行為使得美國軍方大感不解。例如：「日本對戰爭的起因却持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只要每個國家都還擁有絕對的主權，那麼世界就不能脫離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因此日本必須藉戰爭來建立一個國際階層組織，而由日本統馭；因為只有日本才是一個真正具有上下嚴謹階層組織的國家，也因而只有他們才真正了解『各守本位』的必要性。」日本民族對階層組織的執着與信心使酷愛自由與平等的美國人大為困惑。再者，曾經誓死不降，認為投降或被俘會使自己蒙羞的日本士兵，後來却給與盟軍充分的合作。而當日本天皇宣告戰敗詔書後，連一向最具侵略性的關東軍也即刻棄械停戰，最令美國占領部隊官兵難以置信的是，過去曾誓死以竹槍奮戰到底的日本民衆，却湧集在東京街頭及偏遠的鄉間路邊熱烈的歡迎美軍的登陸（第二、十三章）。潘乃德認為，促使日本人形成這些令人難以

理解的行為與觀念之基本因素是其傳統的嚴格階層制度。「日本人慣於透過他們的階層觀念來看整個國際關係問題，就像他們用同一觀點來看其內部問題一樣。」由於日本人一直自視為處於國際階層體系的頂端，因此他們有義務使「萬邦各守其位，兆民安居樂業」，偷襲珍珠港與發動對華侵略，都是這種階層觀念的實現。而「在家庭和人際關係中，年齡、世代、性別、階級支配着適當的行為。政治、宗教、軍隊、工業等各種領域內，都有週全的階層區分；在上者或在下者如果逾越權限，都會受到制裁。只要『本位』被維持着，日本人絕無抗辯之言；他們覺得安全。他們之爲安全，並不一定是因爲最大的幸福受到保護，而常是因爲他們接受階層組織爲一種合理的制度。」（第三、四章）每一個人在整個階層體系中各有一個本位，他們必須遵行他的本位所應盡的義務。在日本，每一個人都從上一階層或同一階層的人手上承受某種「恩」。例如，一個人的第一個（也是最大的）恩是來自天皇，這就是「皇恩」。從父母那裏，他們承受了「親恩」，從老師那裏，他們接受了「師恩」。此外還有其他各種各類的恩。日本人認爲恩是一種債欠

，他們每接受一次恩，就表示內心增加了一分負債，而負債是必須償還的。債欠的種類有二，一是「義務」，一是「義理」。前者是無法完全償清，也沒有時間限度的債欠，如皇恩、親恩。後者則具有時限性，而必須視所受的恩惠之大小而等量償還。償還第一類債欠（義務）的方式是對天皇盡「忠」、對父母及祖先盡「孝」，這兩種義務都是無條件而絕對的。因此，天皇要臣民死，臣民不敢不死，天皇要士兵降，士兵不敢不降。償還第二類債欠（義理）的方式則包括對君主、姻親及他人之義務，而在受辱或失敗時有洗刷污名之義務（亦即報仇），在平時則有遵守禮節之義務（如循規蹈矩、嚴守身分、克制情緒）（第五章——十章）。日本人由於對階層組織的信賴與報恩觀念之運作，而形成潘乃德在「菊花與劍」第一章所歸納出來的雙面性格。這種性格的培養則有賴童年期的教養與自我的修練而逐漸強化（第十一、十二章）。

以上簡略的說明了「菊花與劍」一書的內容。本書出版後兩年（一九四八年），日文翻譯版就在日本大量發行，到了一九五二年，已經發行到第八版。這本書在日本之所以暢銷，除了因爲這是由一位未曾到

過日本的美國婦女執筆，以及因為當時日本國內正在深入的自我檢討之外，作者潘乃德組合材料的獨特筆法與不尋常的洞察力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是，「菊花與劍」的暢銷並不意味它是完美無瑕的。日本學者對於「菊花與劍」曾經做了許多批評，甚而在一九四八與一九五一年舉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討論會，尤其是一九五一年年的討論會，總計舉辦了十二次的討論，歷時五個月方始結束，其盛況恐怕只有近幾年前的「中國人格綜合討論會」可以與之比擬，這個現象一方面顯示出日本學者對於外人對其觀感的重視，一方面則顯示出「菊花與劍」在內容與方法論上不無可議之處。

做為一個從未占有日本階層社會中任何一個本位的人，我們不擬對潘乃德所描述的日本民族的性格之真實性妄加批判。但是做為人類學的研習者，我們對「菊花與劍」可以提出下列幾點有關方法論的批評：

一、過份同質的假設——潘乃德在「菊花與劍」中，將她對日本民族性的結論概推到所有日本人，而認為所有的日本人都具備她所說的兩面性格，這種為日本人為視一個高度同質社羣(homogeneous

group)的假設是值得商榷的。大部份有關民族性的研究都有同樣的缺點。日本學者和辻哲郎(Tetsuro Watsuji)認為潘乃德所描述的模式只是代表戰爭時期的軍人與法西斯主義者，其他人則具有相當不同的性格。這個缺點除了肇因於潘乃德自「文化模式」一書以來的一貫思潮之外，也受到樣本多寡的影響。

二、樣本代表性的問題——潘乃德「菊花與劍」一書中從未提過她所訪問的日本人的多少，而他們的職業、教育程度、性別……等更是無法知曉，因此我們根本不能了解潘乃德訪問的對象(樣本)對於整個日本文化到底具有多少代表性。潘乃德在描述日本人驕武而具侵略性的特徵時，她的樣本應該是來自戰爭時期的軍人與日本文獻中的武士，但在描述日本人溫柔、沉靜的一面時，她的樣本似乎是出自杉本夫人、三島小姐之類的女性。將兩羣不同樣本所顯現的對立模式綜合起來，而推論為整個日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其適當性是頗值討論的。

三、實證資料的應用問題——潘乃德在美國所訪問的日本移民是在明治天皇時代(一九〇〇——一九二五)遷移去的，而她却利用這些訪問資料來概推昭

和時代（一九二六年以後）的日本人，這一點引起相當多學者的批評。另一個最常見的指責是她所用以建構日本人理念的材料，有許多是軍部的宣傳與合理化的說詞，不能代表日本人實際的理念或行為。

四、變遷的問題——潘乃德似乎將日本的文化模式視之為一成不變的，但是日本學者指出，日本的文化曾經歷過幾次的改變，而潘乃德所指陳的應該是幕府時期的文化，或者說是幕府時期文化遺留至現代的殘迹。有些日本學者認為潘乃德未能了解當代日本的變遷，而將新舊兩種文化混淆在一起。

雖然「菊花與劍」有著上述的缺陷，但是仍然無損其價值。潘乃德所搜集到的材料非常豐富，而且相當深入，在當時有關國民性的研究中，「菊花與劍」是相當傑出的一本著作。更值得稱道的是潘乃德的概念架構。她能够從政治、經濟、宗教、家庭生活……等各個層面的行為抽離出若干與國民性有關聯的現象而連結起來，充分的表現出人類學家「整體研究」（holistic）的觀念，對於非人類學家有一股相當大的衝擊力，日本學者對這一點備加讚揚。即使是在人類學界，潘乃德在這方面的成就也是相當少見的。

再版！

本年度文藝獎章新聞文學獎

現代學人散記

這是胡有瑞女士為「書評書目」所寫的一系列學人作家訪問記，胡女士所賴以得獎的採訪文筆，在本書中表露無遺。她讓學人作家「掬懷相付」地剖述自己的人生觀、作學問的態度及讀書的方法等，讓讀者沐浴春風之餘心靈激起無數的火花與信心。

定價每本四五元

直接函購八折（九月二十日止）

書評書目社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
地址：南京東路三段96號二樓
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